

论《尚书》的历史教育思想与价值^{*}

周 倩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尚书》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不仅包含深刻的历史思想，还内蕴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其要有三：其一，殷周君主常常追慕先公先王的功绩，将他们奉为自己执政的榜样和目标；其二，他们还习惯通过回顾先代亡国之痛来反省今日行政之失误；其三，西周统治集团很早就形成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自觉史鉴意识。《尚书》是中国古代先民学习和利用历史知识的典范，不仅能够帮助今人了解殷周统治者借鉴历史上正反两方面案例治理国家的具体情形，感受上古贤主勤政为民、衣宵食旰的精神品质，还能促进人们“疏通知远”历史思维的涵养，具有很高的历史教育价值。

关键词：《尚书》 历史教育 史学思想 价值

《尚书》作为中华元典“六经”之一，是中国上古政典的汇集。虽然《尚书》在传习过程中出现了版本、篇章、文字等多方面的变化，但是《汤誓》《盘庚》《牧誓》《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篇章基本可以确定为殷周时期的作品。这些篇章不仅集中展示了殷商和周初统治者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情形和基本理念，还从侧面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思想，其中对于学习和利用历史知识，形成了一

* 本文系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的课程体系建设研究——基于OBE教学理念的探讨”(YZUJX2020—D2)、“扬州大学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示范课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系列历史教育思想，其要有三。

一 举先公先王之迹以资政

根据《尚书》记载，殷周君王常常追慕本族先公先王，将他们的光辉事迹视为执政的典范和榜样。如《盘庚》篇，全文的主体是商汤十世孙盘庚在迁都前后对臣民发表的三次讲话。商朝自商王仲丁以后，国势逐渐衰落。盘庚即位后，为了彻底改变混乱不定的局面决心迁都。他的计划是将都城从黄河之北迁到黄河之南，“复居成汤之故居”。然而这一举措并不顺利，殷民“乃五迁，无定处”，于是“咨胥皆怨，不欲徙”，^①使得迁都复兴计划受到很大阻碍。在这种背景下，盘庚发表了对殷民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及商族先祖放弃旧都的事例，以此劝说民众动身迁徙、建设新都。

按《盘庚》篇记载，盘庚在迁都前将民众召唤至面前，首先便说：

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
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②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哎呀，过去我们的先王没有一个不是顾全民众的，先王那样惠爱民众，所以能够顺应天时。每当老天降下灾祸，先王并不留恋亲手缔造的宗庙都邑，总是根据民众的利益进行迁徙。在这里，盘庚不仅告诉民众迁都早有旧例，还将先王迁都之举与顺天、保民结合起来，大大加强了迁都的合理性。接着，他由古及今，说道：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③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想想先王的这种勤勉呢？我也是为了保护大家，让大家生活安好，并不是像惩罚罪犯那样对待你们！我之所以

^① 《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102页。

^② 《尚书·盘庚》。

^③ 《尚书·盘庚》。

呼吁大家到新都去，也正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这样，盘庚借助先王迁都之事，解释了自己迁都的目的，最终获得了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盘庚迁都后，又告诫众官员道：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
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
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①

从前我们的先王要发扬前人的功业，迁到高地避免灾害，在都邑里遵循维系前代业绩。而今我的子民遭受洪水流荡肆虐之苦，简直没有尽头。你们反倒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来迁都啊？”这是因为上天要恢复我们祖宗的基业，我虔诚地敬奉上天旨意来拯救人民，这样才能永远安居在这新的都邑。根据文中内容可见，有些殷商官员是对迁都存在疑问甚至表示不满的。盘庚又以先王迁往高地以避免灾祸的事例，再次讲明了迁都的必要性，有利于重新赢得贵族阶层的支持，稳定社会上层秩序，从而为迁都后的执政工作打好基础。

盘庚迁都后，有些民众不喜欢这个地方，社会又呈现动荡之势。盘庚再一次通过贵族晓谕民众，他说：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
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
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②

盘庚表示，先王有老规矩，要谨遵天命，不敢贪图安逸。他们并不老是赖在一个地方，而是已经迁都五次了。我们现在如果不依照先王的成例，难保上天不会断绝我们的天命，怎么还能谈得上先王功业呢？就像倒断树木可以发出新的枝丫，老天要把我们迁移到新都，是要让我们长久地存续，复兴先王的伟大功业，把四方都安定下来。这里，盘庚再一次提到先王五次迁都之事，并指出“今不承于古”，可能导致“天之断命”的危险，讲

① 《尚书·盘庚》。

② 《尚书·盘庚》。

明了迁都的紧迫性，有利于安抚广大平民的情绪，稳定社会中下层秩序。总之，盘庚对民众发表的三次讲话虽背景不同，但不约而同地运用先王迁都之旧例，分别阐述了今日迁都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史鉴劝导告诫殷民，有效地化解了迁都前后的政治困境。

除了殷商君王，周初统治者也常常追思先王之迹以资政，这在“周初八诰”中有鲜明地体现。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故以周公辅政。而彼时管叔、蔡叔勾结武庚发动叛乱，周公为稳定新占领的东方地区，决定联合诸侯东征平叛，《大诰》就是周公进行战前动员的语录。

周公作《大诰》，其主要目的不仅在于鼓舞将士们的士气，更要说明东征的合法性。为此，他首先摆出占卜结果，说成王用文王传下来的大宝龟来占卜，结果三个龟板都呈吉兆。但是这样还不够有说服力，仍有不少诸侯和官员迟疑，认为“不可征”，希望“王害不违卜”，^①即要求成王违背卜兆。周公便以周文王重视占卜的事为例，进一步说明依卜行事的合法性，他说：

天休于文王，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②

老天爷庇佑文王，使我们小小的周邦兴盛起来。文王就是因为懂得遵照占卜行事，才能继承天命。今天老天爷还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能依照占卜行事。这里，周公指出文王对卜辞的尊崇与周族兴盛的密切关系，为依卜东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他接着对诸侯和官员说：“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③你们中有很多人是我先文王的旧臣，还能很好地遵循文王之道吗？你们知道文王有多勤于政事吗？在这里，周公又从诸侯、官员与文王的君臣关系出发，要求他们克服万难，谨遵文王旧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可见，周公运用文王之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论证了东征的必要性，统一了众多不同的意见。

周初统治者追思的对象不仅有本族先王，还有殷商贤王。彼时，周武王少弟康叔被封为卫君，居于殷商旧地。周公担心他年幼，在册封时对他

^① 《尚书·大诰》。

^② 《尚书·大诰》。

^③ 《尚书·大诰》。

进行了一番教导，其诰辞形成《康诰》。周公要求康叔到了殷地，一定要“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其中说道：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祇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①

周公对康叔说，你的父亲文王能明德慎罚，因此得到天命，灭掉强大的殷商，缔造华夏。你之所以能够到殷地管理其人民和土地，都是承继文王的事业。殷地的百姓多么痛苦！你应该敬重遵循父亲文王的德政，还要继承殷人的好文化。这次要广泛寻求殷商先王的治国之道，用来安定统治，使得人民安乐。他又说：

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义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②

在百姓境遇好时，我们尚且要学习殷商圣王治民之方，何况现在百姓境遇不好，简直是无所依附，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政治可言呢？周公如是说，言下之意是强调在当今困境之下，效仿殷商圣王对巩固殷商旧地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可见，《康诰》不仅称颂文王之功，还多次提及殷商先王治国理政的伟大功绩，其目的就是要提醒康叔承继殷商古圣王的治国之道，以安定殷遗民。

二 思亡国之痛以自省

周初统治者不仅重视追思、学习和运用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卓越功

^① 《尚书·康诰》。

^② 《尚书·康诰》。

绩和成功经验，还常常思考前朝亡国之史，以此为警诫。如《召诰》篇中，作者就通过召公之口向成王描述了殷商灭亡时的惨状：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瘞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①

召公说，上天以前曾想长久地延续大邦殷的天命，许多殷商先王的神灵都在天上。等到了他们的后裔那里，一开始还能遵服天命，可是最终所有贤人都隐藏起来，是多么大的痛苦啊！那是父母怀抱了孩子，丈夫搀扶了妻妾，哀号着呼告苍天，诅咒纣王灭亡，是多么痛苦不安啊！召公作为商亡的亲历者，讲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成王引以为鉴，清楚认识到不施德政的严重后果。于是，他直接点明主题：“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② 哎呀！老天怜惜四方百姓，所以顾视天下寻找一个勤勉有德行的人予以天命。我王一定要敬守德行啊！

“周初八诰”在鉴亡国之事时，除了直抒胸臆，还常常将亡国之君与兴国之君并举，在对比之中凸显亡国之因，更具警示之意。上文说到，武王少弟康叔被封至殷商旧地，周公担心康叔年轻，会耽于饮酒而误国，故“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③ 其诰辞形成了《酒诰》。《酒诰》开篇，周公就讲了文王禁酒之事，说道：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聆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④

昔日文王在岐山时候，就早晚告诫诸侯、官吏和宫内办事人员：“禁止喝酒啊！上天降我天命，自改元之日起，百姓该过新生活了。天命威严，我

^① 《尚书·召诰》。

^② 《尚书·召诰》。

^③ 《史记》卷37《卫康叔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1590页。

^④ 《尚书·酒诰》。

们的百姓大乱而丧失德行，无非喝酒造成的过错；而大大小小国家的丧亡，也无非喝酒造成的恶果。”可见在周族兴起之时，部族首领已经明确知晓过度饮酒会导致个人德行的丧失和国家政权的灭亡。而这一结论的得出一定建立在前代教训的基础之上。接着，文王又具体谈了饮酒的原则：即不许经常喝酒，当和国君聚会时，按礼虽然不得不喝，须以德自持，不能喝得大醉。周公认为，“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① 正是因为我们西土的年轻人早早接受文王的教令，不贪图喝酒，所以现在才能够继承殷的天命。

那么，殷商君王从一开始就沉溺于饮酒吗？事实并非如此，周公又说：

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祇辟。^②

周公指出，殷商先代圣王，因为惧怕上天和人民的力量，而长久地保持他们的德行和才智。从成汤至帝乙，达成王业仍旧能严肃自省。那时候，宫里管事的臣子就是休假没有工作的时候，也不敢趁着闲暇寻欢作乐，何况放肆喝酒呢！那时候，地方的侯、甸、男、卫各国君，朝廷中的官僚首长，管理王族的宗工，以至于氏族长官，一概不敢酗酒。不敢，也没有空。他们只是帮助商王成就大业、治理百姓和谨守法度。

可见，正是因为周文王和殷商先王明令禁酒，国家才能不断走向兴盛；相反，殷商的衰亡也与末代君主耽于饮酒密切相关。因此周王话锋一转，说道：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蠹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

^① 《尚书·酒诰》。

^② 《尚书·酒诰》。

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①

周公表示：我又听说，殷商的末代君王喜欢用威权压迫百姓，没有什么行为可以使百姓欢喜，只能得到不可改变的怨恨。他们又放纵淫乐，在享乐中逐渐丧失了威仪，百姓没有不伤心痛惜的。然而，他们还是贪酒，无休无止地享乐。他们的心凶狠，又不怕死。他们在商都作恶多端，至商灭亡的时候还不知道忧虑。他们根本没有德行可以上闻于天，只有百姓的怨恨和百官酗酒的臭味升上天空。所以，老天才把丧亡之祸降于他们，不再留有一丝眷爱，这就是他们过度淫逸的结局。周公通过论述商朝“先哲王”和“后嗣王”的统治，使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哲王从成汤到帝乙都“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②各个勤于政事，不自我安逸享乐，上行下效，官员们也都尽心辅佐国君，不敢沉湎于饮酒。相较之下，后嗣王纣却“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饮酒享乐，淫乱游乐不止，结果便是“降丧于殷，罔爱于殷”。^③以“先哲王”之兴和“后嗣王”之亡进行对比论述，总结出殷商兴亡的原因并以此作为经验教训，体现了周代浓厚的“殷鉴”色彩。

与《酒诰》篇类似的还有《无逸》篇。周公为教诫成王勤勉治国、不要贪图安逸，作《无逸》篇。周公开篇便直奔主题，说道：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④

这话的意思是说：哎呀！君主一开始就不能够贪图安逸啊！如果他事先了解了耕种收获的艰难，再去享受安逸的生活，才能够明白百姓们的疾苦。在这里，周公将“无逸”视为君主最重要的行为规范，且将“知小人之依”作为君主勤政的主要目标。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周公接下来讲述了殷周先王的执政事迹：

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

^① 《尚书·酒诰》。

^② 《尚书·酒诰》。

^③ 《尚书·酒诰》。

^④ 《尚书·无逸》。

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弗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弗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①

周公指出，殷商中宗祖乙严肃恭敬，一直恪守天命，治理国家小心谨慎，从不敢怠慢。高宗武丁早年在民间吃了不少苦，即位后沉默不言，三年不论政事，而是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他不敢荒废国事，使国家太平、百姓无怨。商王祖甲本来没有打算称王，在民间生活。他登上王位后，很明白小民疾苦，不敢轻慢孤苦无依的人。而周族的太王、王季谦恭戒惧，而文王秉承两位先王的德行，亲自管理道路修理和农业生产两件大事；他心怀仁爱、关心小民、勤勉执政，常常从早上忙到晚上都没空吃饭，更不沉湎于游乐狩猎。在这里，周公不仅为成王历数了这些先公先王勤政的例子，还特别说明了他们的在位时间：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文王在位五十年，可见这些先公先王的执政时间都非常长。相反，之后的君主没能继承先王勤政的传统，在位时间都很短：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弗知稼穑之艰难，弗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②

以后的君王生于安逸，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的艰难，不知道百姓的劳苦，只是寻欢作乐，因此，没有一个能长久在位，或者十年，或者七八年，或者五六年，或者三四年。周公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说明了国君的作为与享国时间的关系，只有“无逸”才能长享国祚。

^① 《尚书·无逸》。

^② 《尚书·无逸》。

三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周初统治者不仅善于借鉴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案例来服务现实的政治统治，还在对历史的回顾反思中逐渐形成了“以史为鉴”的自觉意识。《史记·卫康叔世家》就记载：“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①周公要求康叔到殷地后，一定要向殷地的“贤人君子长者”了解殷商兴衰之因，可见他将“以史为鉴”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在“周初八诰”之中，周公也反复强调史鉴的必要性。如《康诰》篇中，他在向康叔传授治国之道时就说道：

封！予惟不可不监。^②

如《无逸》篇，周公在讲述了殷商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虚心纳谏、谨于德行的例子之后，感叹道：

呜呼！嗣王其监于兹。^③

再如《君奭》篇，周公分别以成汤、文王和纣王时期为例，从正反两方面为召公阐述了辅臣对国家的重要性，然后总结道：

呜呼！君，肆其监于兹！^④

周公再三告诫君主重臣，一定要以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为鉴，可见他对于历史的认识不仅停留在运用层面，而且将史鉴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思维方式。

周公的史鉴思维在《召诰》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召，指的是召公奭。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打算让召公奭营造洛邑，以管理殷民、加强统治。成王同意这个建议，于是周公、召公赞美了成王的决定，进而勉励他敬重

^① 《史记》卷37《卫康叔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1590页。

^② 《尚书·康诰》。

^③ 《尚书·无逸》。

^④ 《尚书·君奭》。

贤人、施行德化，延续文武二王的伟大事业。这些言辞形成了《召诰》。据《召诰》记载，周公在新都洛邑动工前发表演说，其中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历史的借鉴和思考。

一则，他通过回顾历史表达了自己对“小邦周”继承天命的隐忧：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①

周公认为，天更换了天子，让周族的王继承了大邦殷商的天命，这固然是大的好事，但也是无穷的忧患啊！我们怎么能不敬慎警惕呢！他为何要忧惧警惕，以至二发“呜呼”之感慨呢？这正是他观察殷商灭亡的历史的结果。大邦殷商曾获天命，却最终失去天命，最终“智藏瘞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②这一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们惊心自省吗？因此周虽得天命，仍不能高枕无忧。可见，周公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正是在史鉴思维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则，周公通过史鉴思维总结了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他说道：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③

古代先民夏人建立了夏国，因为顺从天命而受到老天的庇护；可到后来他们违背天道，结果失去天命。再看看殷商，他们本来也是受天保佑的，后来违背天命，所以会丧失天命。可见，周公通过观察历史，总结出夏商二朝兴衰的共同点，即是否顺从天命。那么，夏商二朝最终丧失天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周公又说道：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④

^① 《尚书·召诰》。

^② 《尚书·召诰》。

^③ 《尚书·召诰》。

^④ 《尚书·召诰》。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说夏享有天命的时间有多长，我也不敢说不长久，只知道他们不敬德才早早丢掉天命，我不敢说殷商享有天命的时间有多长，我也不敢说不长久，只知道他们不敬德才早早丢掉天命。这里，周公又通过对夏商历史的观察得出“天命无常，惟德是敬”的结论。

三则，周公强调史鉴思维的重要性。为了让新建的周王朝永保天命，即“祈天永命”，年轻的君主就必须敬德。那么君主该如何敬德，又该如何防止失德？周公认为，以夏商历史为鉴是有效的方法，因此他明确说道：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①

这里的“不可不”，说明了以夏商为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②现在我王既然继承天命，我们也该思考夏商兴衰之因，这样才能继承他们的功业。

四 结语

通过对《尚书》中代表性篇章的研读分析，我们总结了《尚书》的三大史学思想，这些思想的现代教育意义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人们可以借此了解殷周统治者借鉴正反两方面历史案例来治理国家的具体情形，感悟和学习中国上古圣贤君主勤政为民、衣宵食旰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彼之思想可以内化为我之思维。《礼记·经解》曾说：“疏通知远，《书》教也。”在《礼记》作者看来，“疏通知远”是《尚书》的核心教旨。这里的“疏通”即观察并贯穿过往历史，“知远”即预见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殷商和周初的杰出君王深谙历史对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意义，善于回顾历史、思考历史，并将历史经验教训运用于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之中，这从本质上说就是“疏通知远”历史思维的具体体现。故今天的学生和广大民众阅读《尚书》，也可以由此学习和涵养“疏通知远”的历史思维。可见，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丰富思想遗产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追慕、感悟历史，还有助于锤炼和塑造人们的历史思维。

中国古代史学昌盛，史籍浩如烟海，其中一部分编纂优良、思想精微

^① 《尚书·召诰》。

^② 《尚书·召诰》。

者扬名古今，成为广泛流传的史学名著。它们不仅具有史学研究价值，还具有较高的历史教育价值。人们通过研读、分析和阐释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不仅能够丰富中国古代史知识储备，还能体悟史书内蕴的史学思想，进而提高自身历史素养和历史思维能力。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是今天开展历史教育工作可堪运用的重要资源。